

第一章义净生平考述

知人论世，本章拟根据所有现存有关的史料，全面地考察义净一生的事迹，并说明他在历史上的某些影响。本章分以下几个部分：

- 一、籍贯、家世与出家事迹；
- 二、西行求法；
- 三、归国与两京译经；
- 四、著译编年目录；
- 五、简短的结语。

一、籍贯、家世与出家事迹

义净，唐代齐州（今山东济南，唐时治历城，辖数县，地域更宽）山庄人，姓张，本字文明。义净是他出家后的僧名。

义净生于唐贞观九年（635）。关于他的身世，没有像详细记载玄奘一生事迹的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（以下简称《慈恩传》）那样的传记。现存有关义净的史料，除了义净自己的两部著作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和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中的一些片段外，保存在唐代著作中的主要有智升的《续古今译经图记》和《开元释教录》（以下简称《开元录》）卷九·圆照的《贞元新定释教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贞元录》）卷十三中的义净的小传。我们考察义净的生平，主要就依靠这些史料以及其它一些零星的材料。义净生于贞观九年，是依照

《开元录》等讲他去世于先天二年（713）去世时79岁推算出来的。

关于义净的籍贯，过去历来有两种说法。一种说是齐州，一种说是范阳（今河北涿县）。主张范阳说的人较多。近代人梁启超、蒋维乔、冯承钧、汤用彤等都持范阳说。外国学者沙畹、高楠顺次郎等也持此说。主张齐州说的人较少。陈垣先生编《释氏疑年录》即持齐州说。但是细考这两种说法，应该说只有齐州一说是正确的。^①

义净生在齐州山庄。山庄一地，名不见经传，很使人怀疑是“山在”一名之误。古书“庄”字常写作“莊”或“莊”，与“在”字形非常相近。而唐初齐州所辖数县，山在正是其中之一，位置在州治历城之西，即今济南市西的长清县。^②义净后来七岁时入齐州城西四十里许的佛寺里出家，也恰好在这一带。这样看来，义净极可能就是齐州山在人。

唐代是佛教最盛的时代，齐州地区佛教也很流行。长清县境内有著名的灵岩寺，梵宇辉煌，僧人众多，当时被称为“天下四大名刹”之一。大概这给义净从小就信仰佛教创造了环境和条件。义净出家时的两位师父就是从这座寺庙出来的。

据唐中宗《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》讲，义净的高祖曾经作过东齐郡守，而且还“仁风远扇，甘雨随车，化阐六条，政行十部。”^③前者是事实，后面的话恐怕只是一般的赞誉之辞。但所有这些都已不可详考。从时间上推断，那可能是隋代初年或更早的事。义净的高祖既然作过郡守一级的官僚，说明他的家庭至少在高祖一辈是有地位的。他的祖父和父亲虽然没作官，但“放旷一邱，逍遥三径”，恐怕也不是很贫寒。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，有地位的人家的子弟很小就出家为僧，倒是很常见的事。玄奘和他的哥哥长捷就是例子。^④《高僧传》、《续高僧传》、《宋高僧传》中的例子更多。

贞观十五年（641）义净只有7岁，便出家到了齐州城西四十

里许的土窟寺。后来义净在《寄归传》卷四‘古德不为’章里自己讲到这件事：

“且如净亲教师则善遇法师也，轨范师则慧习禅师也。年过七岁，幸得亲侍。斯二师者，并太山金舆谷圣人朗禅师所造神通寺之大德也，俗缘在乎德贝二州矣。二德以为山居独善，寡利生之路，乃共诣平林，俯枕清涧，于土窟寺式修净居，即齐州城西四十里许。”^⑤

朗禅师即二秦时有名的僧人竺僧朗。他最早在泰山西北造神通寺，也就是后来一般所称的灵岩寺的前身。土窟寺现在在哪里，已不可考。不过，寺虽以土窟名，未必就在土窟中。

7岁的孩子出家，恐怕不完全是自己的主意。由此看来义净的家庭是信仰佛教的。义净的年纪很小，两位师父对他很是爱护。他在《寄归传》里又写道：

“又（慧习）禅师每于闲夜，见悲韶卅，曲伸进诱。或调言于黄叶，令鬻忆母之忧。或喻说于鸟禽，希怀报养之德：‘汝可务绍隆三宝，令使不绝，莫纵心百氏，而虚弃一生。’既而童子十岁，但领其言，而未详深旨。每至五更，就室参请。禅师必将慈手赐抚搦摩，实如慈母之育赤子。或餐甘膳，多辍味见贻。但有取求，无违所请。法师乃恩厉父严，禅师则慈伸母爱。天性之重，减无以加。（同上卷章）

义净写这段话的时候，已经是五十六七岁的老人，可见师徒之间当年确实相处得非常融洽，相互间有很深的感情。

贞观十九年（645），义净11岁。这一年，玄奘在印度游学十几年后，终于回到长安。这在当时是轰动朝野的一件事情。义净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已经开始懂事，至少从师父那里，他也知道了这件事。第二年，亲教师善遇法师去世，葬在土窟寺的西园。这时义净的佛教信仰已经比较坚定了。义净自己说：

“法师亡日，净年十二矣。大象既去，无所依托。遂弃

外书，钦情内典。十四得霑缙，十八拟向西天。至三十七，方遂所愿。（同上卷章）

只是他在晚年临终时的讲法稍有不同：

“年始一十有七，思游五印之都。”^⑥

而智升在《续古今译经图记》和《开元录》卷九中为他撰写的小传则说他“年十有五，志游西域”。^⑦但不管怎么说，义净很年轻时就萌发了到印度去求法的念头，这是事实。义净有这样的想法，很明显地是因为受到了前辈僧人法显和玄奘，其中尤其是玄奘的成功形象的鼓舞。所以义净后来在写《求法高僧传》时，第一句话就讲：“观夫自古神州之地，轻生徇法之宾，显法师则创辟荒途，奘法师乃中开王路。”^⑧始终把法显和玄奘当作自己的榜样。

永徽六年（655），义净满了21岁。按照惯例，慧习禅师为他举行了授具足戒的仪式，他正式成为一位僧人。《宋高僧传》卷一讲他“法腊五十九”，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算起。^⑨他自己则在《寄归传》中讲道：

“及至年满进具，还以禅师为和尚。既受戒已，忽于清夜行道之际，烧香垂涕而伸悔曰：‘大圣久已涅槃，法教讹替，人多乐受，少有持者。汝但坚心重禁，莫犯初篇。余有罪愆，设令犯者，吾当代汝入地狱受之。烧指烧身，不应为也。’进奉旨日，幸蒙慈悲，赐以圣戒，随力竭志，敢有亏违，虽于小罪，有怀大惧。”（同上卷章）

从这一段回忆看来，大约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义净特别重视佛教戒律的学习，这可能也是他后来特别选择律作为他翻译的主要对象的原因之一。从此以后的五年之间，义净主要学习律典。

《寄归传》接着讲：

“于是五稔之间，精求律典。历律师之文疏，颇议幽深；宣律师之钞述，窃谈中旨。即识持犯，师乃令讲一遍，方听大经。乞食一餐，长坐不卧。虽山寺村遥，亦未曾有废。”（同上卷

章)

这段时间是从永徽六年到显庆四年(659)。

当时僧人都有出外游学的风气。义净可能也想到了这件事，可是没有下定决心。然而慧习禅师鼓励他出外游学，告诉他说：“我目下且有余人给侍，勿废听读，而空住于此。”于是义净才辞别慧习，仗锡东魏，颇沈心于《对法》、《摄论》。负笈西京，方阅想于《俱舍》、《唯识》。当时这几部经刚由玄奘译出不久，十分流行，讲习的人很多。义净通过游学，大大地提高了自己在佛学方面的修养。

麟德元年(664)二月五日，大翻译家、一代高僧玄奘在长安去世。玄奘的葬礼极为隆重，据说“京邑及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万余人。”^⑩这时义净很可能也正在长安。如果是这样，玄奘的葬礼一定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玄奘去世后，义净去印度的决心更坚定了。

二、西行求法

唐高宗咸亨元年(670)，义净已经36岁，可是他去印度的愿望还没有实现。这一年他在长安，仍然是在各个寺庙里听习佛经。听习中他认识了并州的僧人处一，莱州的僧人弘祇，还有其它两三位僧人。大家都有去印度求法的意思，便相约一起出发。义净先由长安返回齐州，向慧习禅师请命。^⑪慧习禅师非常支持他远行的打算，对他说：“尔为大缘，时不可再。激于义理，岂怀私恋？吾脱存也，见尔传灯。宜即可行，勿事留顾。观礼圣踪，我实随喜。昭隆事重，尔无间然。”真是对义净很大的鼓励。

义净又来到善遇法师的墓前，向去世已经二十多年的法师辞行。这时正是秋天，墓前霜林半拱，宿草填塋。义净仍然对他这位小时候的师傅非常地感激，他自己写他在墓前的情形：

“神道虽疏，展如在之敬；周环企望，述远涉之心。冀福利于幽灵，报慈颜之厚德矣。”（同上卷章）

作为学生，他始终没有忘掉老师早年教诲之恩。这一点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。

告别了两位恩师，大约在咸亨二年（671）年初，义净从齐州南下，经过濮州、曹州，先到扬州。到扬州时正是夏天。按照僧人的规矩，要坐夏三个月。于是义净在扬州停留了三个月。坐夏结束，已是秋天，义净偶然遇见一位要到岭南道龚州作郡守的人，名叫冯孝铨。两人相随一起到了广州。最初一起相约赴印的伙伴中，处一因为母亲年老，一开始就未能成行；弘祿走到江宁，便改变了主意；在丹阳遇见的一位僧人玄逵，走到广州，也因病而返；唯一剩下的伙伴只有一名晋州的年青僧人善行。义净明白，此行艰难，诚非易事。“神州故友，索尔分飞。印度新知，冥焉未会。”义净非常地感慨，一时踟躅，难以为怀，便模仿张衡的《四愁诗》写了两首诗：

我行之数万，愁绪百重思；
那教六尺影，独步五天陲。

上将可陵师，匹士志难移，
如何惜短命，何得满长祗！

短短两首小诗，他赴印求法，奋不顾身的坚定决心跃然纸上。

在广州的时候，因为冯孝铨的邀请，义净又到了岗州，从冯氏家族得到许多资助。他最后能够成行，很大程度就是靠着冯家在财力上的支持。咸亨二年的十一月，义净和善行一起，搭乘上波斯商人的货船，终于开始了去印度的旅程。这时义净已经37岁了。

古代在南海中航行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义净自己在《求法

高僧传》卷下里描写这段行程：

“至十一月，遂乃面翼轸，背番禺。指鹿园而遐想，望鸡峰而太息。于时广莫初飙，向朱方而百丈双挂；离箕创节，弃玄朔而五两单飞。长截洪溟，似山之涛横海；斜通巨壑，如云之浪滔天。”

真是惊心动魄，艰危之状，可以想象。

但是这次航行还算顺利，风疾船快，不到二十天，义净他们便到达了南海中的室利佛逝国（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巨港）。室利佛逝那时是南海中最重要的交通、贸易中心之一，地方很繁荣，佛教也颇流行。义净在这里停留了六个月，学习声明，也就是学习梵语，为到印度求法作进一步的准备。同行的善行却在这里生了病，只好回国。

室利佛逝国当时一定给义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他后来专门为其它打算去印度求法的中国僧人介绍这个地方：

“又南海诸洲，咸多敬信。人王国主，崇福为怀。此佛逝廓下，僧众千余。学问为怀，并多行钵。所有寻读，乃与中国不殊。沙门轨仪，悉皆无别。若其高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，停斯一二载，习其法式，方进中天，亦是佳也。”^⑫

这大概算是义净自己出国留学的经验。

佛逝国王对义净确实十分友好。《求法高僧传》又讲：

“王赠支持，送往末罗瑜国。复停两月，转向羯荼。至十二月，举帆还乘王舶，渐向东天矣。”（卷下）

和玄奘当年在高昌得到高昌王麴文泰的帮助一样，义净能得到室利佛逝王的帮助，对他很有好处。室利佛逝国当时在南海是大国，势力很大。十多年后，当义净再次回到这里时，末罗瑜已经被室利佛逝并吞了。

《求法高僧传》又继续写道：

“从羯荼北行十余日，至裸人国。向东望岸，可一二里

许，但见椰子树、槟榔林森然可爱。彼见舶至，争乘小艇，有盈百数，皆将椰子、芭蕉及藤竹器来求市易。其所爱者，但唯铁焉，大如两指，得椰子或五或十。丈夫悉皆露体，妇女以片叶遮形。商人戏授其衣，即便摇手不用。传闻斯国当蜀川西南界矣。此国既不出铁，亦寡金银，但食椰子薯根，无多稻谷，是以卢呵最为珍贵（原注：此国名铁为卢呵）。其人容色不黑，量等中形，巧织团藤箱，余处莫能及。若不共交易，便放毒箭，一中之者，无复再生。从兹更半月许，望西北行，遂达耽摩立底国，即东印度之南界也，去莫诃菩提及那烂陀可六十余驿。”（同上）

义净终于到达了印度。根据《寄归传》，这时是咸亨四年（673）二月八日，离开他出发的时间，已经有一年多了。

在耽摩立底国，义净遇见另一位中国僧人大乘灯。大乘灯是玄奘法师的徒弟，比义净先到印度。义净在耽摩立底国住了一年，进一步学习梵语，然后和大乘灯一起，跟随一支有几百人的商队，继续往中印度去。

当时印度小国割据，路上并不太平。和玄奘一样，义净在印度也遇到了危险。这事发生在离开耽摩立底后不久：

“去莫诃菩提有十日在，过大山泽，路险难通，要藉多人，必无孤进。于时净染时患，身体疲羸，求趁商徒，旋困不能及。虽可励己求进，五里终须百息。其时有那烂陀寺二十许僧，并灯上人并皆前去，唯余单己，孤步险隘。日晚晡时，山贼便至。援弓大唤，来见相陵。先撮上衣，次抽下服，空有绦带，亦并夺将。当是时也，实谓长辞人代，无谐礼谒之心；体散锋端，不遂本求之望。又彼国相传，若得白色之人，杀充天祭。既思此说，更轸于怀。乃入泥坑，以叶遮蔽。扶杖徐行，日云暮矣，营处尚远。至夜两更，方及徒闻灯上人村外长叫。既其相见，令授一衣，池内洗身：

方入村矣。’（《求法高僧传》卷下）

这也说得上是九死一生。不过这还只是义净第一次遇险。后来他回国时从那烂陀到耽摩立底，同样的事情又发生过一次。

这时是在咸亨五年（674），义净在印度周游各处佛教圣迹。但是义净在印度详细的游踪我们很难一一追寻。《求法高僧传》卷下有关的一段记载是：

“从此北行数日，先到那烂陀，敬根本塔。次上耆闍崛，见叠衣处。后往大觉寺，礼真容像。山东道俗所赠綈绢，持作如来等量袈裟。濮州玄律师附罗盖数万，为持奉上。曹州安道禅师寄拜礼菩提像，亦为礼讫。于时五体布地。一想虔诚。先为东夏四恩，普及法界含识。愿龙花总会，遇慈氏尊，并契真宗，获无生智。次乃遍礼圣迹，过方丈而屈拘尸；所在钦诚，入鹿园而跨鸡岭。”

那烂陀、耆闍崛、大觉寺都在摩揭陀国。方丈是维摩诘的故宅，作薛舍离国。拘尸城附近的双树林是释迦牟尼涅槃的地方。鹿园就是鹿野苑，是释迦牟尼初转法轮的地方，在婆罗痾斯国。鸡岭也在摩揭陀国。从《求法高僧传》卷上的《道希传》中还可以知道，义净还到过中印度的菴摩罗跋国。和义净一起同行的，仍然是大乘灯法师。

除此以外，只有义净在他翻译的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》里写的一条注可以稍微多提供一点信息：

“比于西方，亲见如来一代五十余年居止之处，有其八所：一、本生处；二、成道处；三、转法轮处；四、鹫峰山处；五、广严城处；六、从天下处；七、祇树园处；八、双树涅槃处。”^⑬

本生处在劫比罗伐窞堵国。成道处在摩揭陀国佛陀伽耶。转法轮处在婆罗痾斯国鹿野苑，也就是前面讲的鹿园。鹫峰山就是耆闍崛山。广严城就是薛舍离城。从天下处又称为三道宝阶，在

劫比他国。祇树园在室罗伐悉底国。双树涅槃处就在拘尸城城边。这些都是古代印度最有名的佛教圣迹，玄奘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中有很详细的记载。不过，除了这些地方，我们就不太清楚义净在印度究竟还到过些什么地方。唐中宗《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》讲义净“所经三十余国，凡历二十余年”，^⑭义净自己也说“历三十之外国”。^⑮这三十多个国家，大概还包括义净从海道赴印所经过的地方。但其中在印度境内究竟有哪些国家，没有更多的材料可以说明。不过，不管怎样说，三十余国的数目，比起玄奘是少多了。

周游了各处的佛教圣迹后，义净又回到那烂陀寺。那烂陀寺那时是印度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学术中心。义净因此在那烂陀住了很长时间，足足有十年，这却超过了玄奘。义净自己记载，他在垂拱元年（685）离开那烂陀东归。照这样推算，他住在那烂陀的时间是从上元二年（675）到垂拱元年。这和前面的经历在时间上也刚好衔接得起来。

在那烂陀的十年里，义净努力学习佛教的各种经典，又收集准备以后带回国的各种梵本佛经。玄奘当年的老师戒贤这时已经去世了，但是那烂陀寺有学问的僧人还是不少。义净在那烂陀的老师有宝师子大德。宝师子擅长讲授《瑜伽十七地》，这显然继承了当年玄奘的老师戒贤法师的传统。离那烂陀不远有一座有名的毘罗茶寺，义净在那里也有一位名叫智月的老师。这位智月，很可能还是玄奘当年见过的那位智月，年纪已经很大了^⑯。义净在《寄归传》里写道：

“其西方现在，则毘罗茶寺有智月法师，那烂陀中则宝师子大德，东方即有地婆羯罗蜜旦罗，南裔有呬他揭多揭婆，南海佛誓国则有释迦鸡栗底。斯并比秀前贤，追踪往哲。晓因明论，则思拟陈那；味瑜伽宗，实罄怀无著。谈空则巧符龙猛，论有则妙体僧贤。此诸法师，净并亲狎筵机，

餐受微言。(‘卷四’西方学法‘章’)

看来义净也是到处寻师访友。他的这些老师都是些大乘僧人。

义净在那烂陀住的时间很长，他因此有机会很仔细地观察那烂陀寺寺院里的规则、僧人们的日常生活、甚至包括寺院建筑中某些很细小的特点。这为他后来写《寄归传》提供了活的材料。所以他在《寄归传》里多次提到那烂陀，把它作为佛教寺院的典范。他还为那烂陀寺画了一张图，附在他后来写的《求法高僧传》里。可惜这张图很早就佚失了。

那时在那烂陀寺里学习的中国求法僧并不只是义净一个人。义净先后在这里遇见好些中国僧人，其中《求法高僧传》中直接提到姓名的有玄照、佛陀达摩、慧轮、道琳、智弘、无行等。有的中国僧人虽然没有见到，但求法僧们互相都知道消息。义净后来把他们求法的事迹专门写成一部书，这就是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。

中国求法僧们远离家乡，去国万里，都是多年在外，在一起时仍然很想念自己的祖国。春中之时，觉树初绿，竹苑新黄，僧人们常常远足登高。一次，义净与另一位中国僧人无行一起，结伴同游离那烂陀不远的鹫岭。两人瞻奉既讫，远眺乡关，无任殷忧。义净赋诗二首，其中短的一首表达了他感觉岁月易逝，事业未成的忧虑和对家乡的怀念：

游，愁；

赤县远，丹思抽；

鹫岭寒风驶，龙河激水流；

既喜朝闻日复日，不觉颓年秋更秋；

已毕耄山本愿诚难遇，终冀持经振锡往神州！

这两首诗都收在《求法高僧传》里。

在那烂陀的这十年里，义净不仅学习，也着手开始翻译佛经。他翻译出了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》和《一百五十赞佛颂》但

只是初稿，后来回国以后又加以删正。看来这时他已经在考虑以后的翻译的计划了。

垂拱元年(685)，义净在那烂陀学习了十年之后，打算回国了。他的好朋友无行禅师送他离开那烂陀，东行六驿，才执手言别。此时两人“各怀生别之恨，俱希重会之心，业也茫茫，涕泪交袂矣”，都十分地难过。没到耽摩立底，义净又第二次在路上遇到劫贼。不过终于还是到达了耽摩立底。随身还带着梵本三藏五十万余颂。

义净同国的路线，和去印度时完全一样，仍是由海路乘船东归。但是不管在《求法高僧传》还是在《寄归传》中，都没有关于他同国时行程的比较详细的记载。只有义净翻译的《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》里他自己写的一条注讲到这事：

“(耽摩立底)即是升舶入海归唐之处，从斯两月泛舶东南，到羯荼国，此属佛逝。舶到之时，当正二月。若向师子洲，西南进舶，传有七百驿。停此至冬，泛舶南上，一月许到末罗游洲，今为佛逝多国矣。亦以正二月而达，停止夏半，泛舶北行，可一月余，便达广府，经停向当年半矣。若有福力扶持，所在则乐如行市。如其宿因业薄，到处实危若倾巢。”^{①⑦}

这条注本来是为中国到印度求法的僧人介绍归国的路程，但看来也是义净自己返国时行程的实录。依照这条注，义净回国时又再次在羯荼国停留过差不多近一年的时间。他在《求法高僧传》卷下的《道琳传》中讲自己“回至南海羯荼国，有北方胡至”，也可以证实这一点。从前后的时间推算，这时应该是垂拱二年(686)。到了冬天，义净再次乘船，回到末罗瑜。这时大约是垂拱三年(687)的正二月间。然后又回到室利佛逝。

义净第二次在室利佛逝停留的时间更长。他在《寄归传》里说：

“旋踵东归，鼓帆南海，从耽摩立底国，已达室利佛誓。

停住已经四年 留连未及归国矣。(卷四“西方学法”章)

义净写这段话时，是在天授二年(691)上半年。^⑮ 在此之后，他还继续留在室利佛逝，一直到长寿二年(693)夏天乘船返回广州。这前后一共有六年多。

但是在这段时期里义净实际上也回到广州过一次。《求法高僧传》卷下所附的《重归南海传》中就讲到这事：

“净于佛逝江口升舶，附书凭信广州，见求墨纸，抄写梵经。并雇手直。于时商人风便，举帆高张。遂被载来，求住无路。是知业能装饰，非人所图。遂以永昌元年七月二十日达于广府。与诸法俗重得相见。”

这是一件比较有趣的事。照着义净自己的说法，他似乎是因为很偶然的机会被载运回国。但是季风将起，能不先有所知？商船启碇欲行，虽然须藉风便，恐怕也不至于慌到连立即下船，片刻的时间都没有，以至于“求住无路”。至于说“业能装饰，非人所图”，不能算是原因。而如果只是“见求墨纸”与“并雇手直”，这两件事，一般说来，写一封信足已能够办到，何必一定要义净本人重蹈风波之险，再受颠沛之苦？须知他自己是深知海上航行的艰难危险的。退一步讲，即使需要义净亲自到广州一趟，似乎也不用作这样的解释。情况好像是，义净本来就有意回广州一次，他觉得有必要亲自与广州法俗相见，只是他没有把这样的意思明白地说出来。而且，他仍然准备重返南海：

“于时在制旨寺，处众嗟曰：‘本行西国，有望流通。回住海南，经本尚阙。所将三藏五十余万颂，并在佛逝国，事须复往。既而年余五十，重越流波，隙驷不留。身城难保，朝露流至，何所嘱焉。经典既是要门，谁能共往收取？随译随受，须得其人。(同上)

制旨寺是当时广州最大的佛寺之一，寺里的僧人给义净介绍

了几位助手。义净在广州只停留了三个来月。永昌元年（689）十一月一日，义净与他约请的四位僧人，贞固、怀业、道宏、法朗一起，再次搭乘商船出发。^{①9}“广府法俗 悉赠资粮。”十二月，船到达室利佛逝。

第二年是载初元年，这时武则天早已作了中国的皇帝。九月，武则天正式改国号为周，又改元天授。这一年和天授二年（691）上半年，义净在这四位僧人的协助下，翻译了一些经典，又写成了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和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两部书。这两部书，后来成为义净最重要的著作。天授二年五月十五日，义净派遣另一位中国僧人大津带着这两部书，他新译的经论十卷，他写给朝廷的表文，“望请天恩于西方造寺”，一起送往长安。^{②0}

派出大津以后，义净现在在室利佛逝就只是等待回国了。

三、归国与两京译经

武周长寿二年（693），义净已经59岁。这年夏天，他终于从室利佛逝最后回到了广州。三年前从广州约请去室利佛逝的四位僧人中，法朗去了诃陵国，后来死在那里，怀业不打算回国，只有贞固和道宏相随回国。

关于义净从室利佛逝回到广州的时间，各书都没有明文记载。各书只记载义净在证圣元年（695）仲夏抵达洛阳，因此过去一般都把这件事系在证圣元年。但是这并没有直接的证据。相反，既然义净在仲夏抵达洛阳，据《旧唐书》卷四十一《地理志》四，广州至洛阳四千九百里。^{②1}即使假定以日行百里计，义净从广州到洛阳，一路上至少也得走四十九天。这样，义净从广州出发的日子至迟也在三月。古代航海，全藉自然风力。南海和印度洋上，每年季风交替，冬季为东北风，夏季为西南风。从室利佛逝北上，必定在夏季。从广州南航，必定在冬季。所以朱或之

《萍洲可谈》卷二说：“舶船去以十一月，十二月，就北风；来以五月、六月，就南风。”^{②②}而义净在他翻译的《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》一书中写的一条注里又恰好提到了这段行程：“停止夏半，泛舶北行，可一月余，便达广府。”^{②③}因此，义净从室利佛逝返回广州，必定不可能在证圣元年年初，而只能在此以前，但又在天授二年以后的某一个夏天。这是其一。

此外，细按《求法高僧传》卷下所附《重归南海传》其中最后讲：“其僧贞固等四人，既而附舶俱至佛逝，学经三载，梵汉渐通。法朗顷往诃陵国，在彼经夏，遇疾而卒。怀业恋居佛逝，不返番禺。唯有贞固、道宏相随俱还广府，各并淹留且住，更待后追。”这就是说，义净第二次从广州到达室利佛逝，在室利佛逝和其它四位僧人一起住了三年，即天授元年、天授二年、天授三年。义净这次从室利佛逝回到广州，只能是在长寿二年，也就是长寿二年的“夏半”。这是其二。

证圣元年（695）五月仲夏，义净从广州到达洛阳。洛阳当时称为东都，皇帝武则天多数时间都住在这里。义净到洛阳之前，是否和当年玄奘一样，先接到皇帝的诏书，史无明文。但从他到达洛阳时受到的盛大欢迎看，皇帝先有准备，他也应该是先接到皇帝的诏书，而后再出发的。^{②④}

义净到达洛阳那天，欢迎仪式规格之高，甚至超过当年的玄奘。玄奘抵达长安时，只是京城留守房玄龄派了一位司马、一位大将军、再加上长安县县令迎接，其余迎接的人虽然多，可是都是僧人与一般老百姓。义净这次回来，却是皇帝武则天亲自出城迎接。《开元录》卷九记载这段经历是：

“以天后证圣之元乙未仲夏还至河洛，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，合五十万颂，金刚座真容一铺，舍利三百粒。天后敬法重人，亲迎于上东门外。洛阳缙侣，备设幢幡，兼陈鼓乐，在前导引。敕于佛授记寺安置。所得梵本，并令翻译。”^{②⑤}

这段记载虽然简单，但是天后亲迎，在当时是极其了不得的事。同样的殊荣，玄奘当年也未能得到。义净后来临终时还提到这件事：“天子亲迎 群公重法。”^{②6} 这一年，义净已经 61 岁。

这时还发生了一件事，与义净有关。据赵明诚《金石录》卷二十五中赵明诚所撰的一篇碑跋讲：

“右《唐中兴圣教序》，中宗为三藏法师义净所作。唐奉一书。刻石在济南长清县界四禅寺。寺在深山中，义净真身塔尚存。今屡往游焉，得此文入录。案《御史台记》，奉一齐州人，善书翰，武后时为御史，后坐诛剪皇族，废。”

《唐中兴圣教序》即《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》。在历代的‘圣教序’中除了唐太宗和武后的‘圣教序’外这篇‘圣教序’也算比较出名，原文尚存。^{②7} 赵明诚是北宋密州诸城人，他妻子李清照是济南人，夫妻俩在北宋灭亡前在济南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赵明诚在长清见到这块唐碑，应该可信。但有意思的是下文中记这块碑碑侧的内容：

“右《圣教序》碑侧云：则天尝得玉册，上有名十二字，朝野不能识，义净能读。其文曰：天册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。证圣元年五月上之，诏书褒答。”

以下赵明诚又评论道：

“案宋莒公《纪年通谱》武后以证圣元年九月授‘天册金轮圣神’之号，故大赦改元。先是司饩局人于水际得石函，有玉册云：神皇万岁忠辅圣母长安，故改元协瑞其文，与义净所载小异云。余尝谓义净方外之人，然区区为武后称述符命，可笑也。然陶弘景号称一代高士，在梁武时，亦屡上图讖，岂独义净哉！”^{②8}

原来武则天这年的授号与改元还有这一段故事。作为正史的新旧《唐书》及《资治通鉴》都记载了这次授号与改元之事可是却漏掉了这段有趣的情节。^{②9}过去不管讲义净，还是讲武则天，还

没有谁提到过这件事。赵明诚记下的碑侧的这段文字，至晚镌刻于北宋，可能还更早。如果这段文字和赵明诚所引《纪年通谱》一书可信，有关的记载可以补正史书中的阙遗。武则天好符瑞图谶，在历史上是有名的。不过，这件事诚如赵明诚所批评，在后来人看来，有些可笑。只是当时风气如此，义净虽是方外之人，也未能例外。

因为这个故事 证圣元年九月 武则天改元为“天册万岁”。十月二十六日，佛授记寺僧明佺领衔编写的《大周刊定众经目录》编成。义净列名编书大德之列，被称作“汉三藏翻经大德大福先寺义净”。^{③①}大概义净在佛授记寺没住多久，便移住到大福先寺。不过，从义净刚到洛阳才五个月，书就编成的事实来看，义净只是仅仅列名编者之列，恐怕并未参加多少实际工作。而这部经录确实也编得很不好，被后来的智升批评为“虽云刊定，繁秽尤多，虽见流行，实难凭准。”^{③②}

和玄奘一样，义净马上就开始了翻译佛经的工作。不过，他最初并没有独自翻译，而是与于阗国来的僧人实叉难陀，还有复礼、法藏等共同翻译《华严经》。译场设在东都大内大遍空寺内，武后“亲临法座，焕发序文，自运仙毫，首题名品”。^{③③}在译场中，义净的职务是与南印度来的僧人菩提流志共同宣读梵本。

圣历二年（699）十月八日，《华严经》全部译完。圣历三年即久视元年（700），从这年起，义净开始独自翻译佛经。他住在大福先寺。五月五日，义净译出《入定不定印经》。武则天为此写了一篇《大周新翻圣教序》其中把义净称作“缁俗之纲维 绀坊之龙象”。^{③④}这可以说明义净当时的地位。

根据《开元录》卷九的记载，从久视元年到长安三年（703）。一共三年多近四年的时间里，义净先是在洛阳大福先寺，后来在长安西明寺，共译出佛经二十部一百一十五卷。译经的速度平均一年近四十卷。考虑到义净这时已经是六十多近七十的高龄，应该